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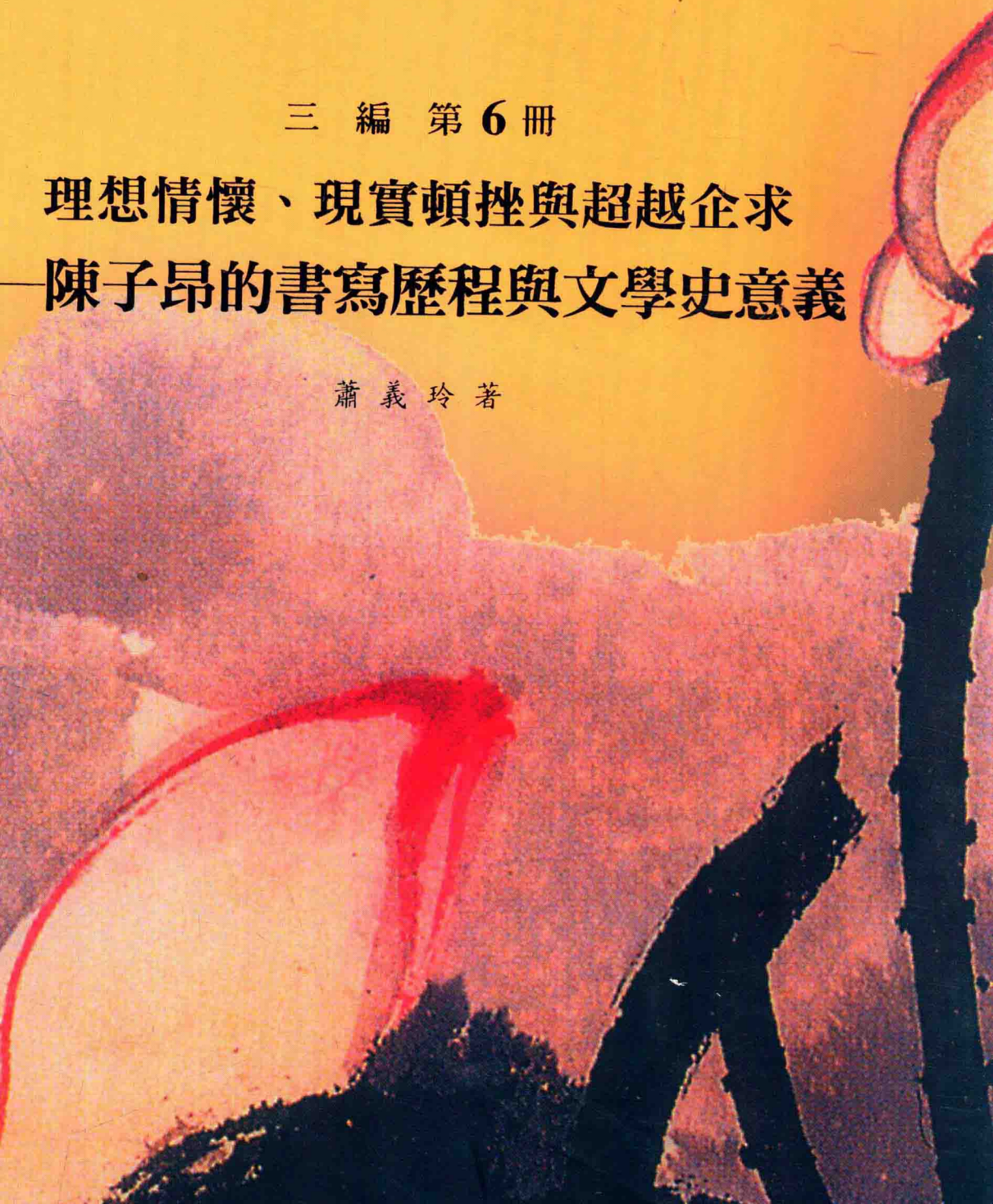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三 編 第 6 冊

理想情懷、現實頓挫與超越企求
——陳子昂的書寫歷程與文學史意義

蕭義玲 著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三 編

曾 永 義 主編

第6冊

理想情懷、現實頓挫與超越企求
——陳子昂的書寫歷程與文學史意義

蕭 義 玲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理想情懷、現實頓挫與超越企求——陳子昂的書寫歷程與文學史意義／蕭義玲 著——初版——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100〕

目 2+22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三編：第6冊）

ISBN：978-986-254-548-5（精裝）

1.（唐）陳子昂 2.學術思想 3.中國文學

820.8

100014998

ISBN-978-986-254-548-5



9 789862 545485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三 編 第 六 冊

ISBN：978-986-254-548-5

理想情懷、現實頓挫與超越企求 ——陳子昂的書寫歷程與文學史意義

作 者 蕭義玲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1 年 9 月

定 價 三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4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理想情懷、現實頓挫與超越企求
——陳子昂的書寫歷程與文學史意義

蕭義玲 著

作者簡介

蕭義玲，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現任教於中正大學中文系。學術興趣在以「存在」命題展開的文人生命樣態之研究。近年研究重心聚焦於現代，以現代性的相關課題，如愛慾、自然、暴力、家園……等，深化對「存在」課題的思索，從古典到現代，希望以對「存在」的關切，深入於對藝術創作之根源探問中。

提 要

中國詩人有一鮮明特點：在濟世理想所展開的人我關係中，一生奮鬥目標實在「政治」而非「文學」。然值得注意的卻是，他們雖然明確地表明了「政治」作為個人奮鬥的最高標的，但是，都在遭遇同樣的生命困局：不為君用、濟世無門。然在什途多舛的政治際遇中，又一約而同地以「文學」成就了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從這個現象出發，本書對詩人的政治理想、現實遭遇，與文學成就之間的關係有莫大興趣，希望探求一條有意義的詮釋途徑，將之間的關係揭櫫出來。以上是就中國詩人的重要「共相」而言，但不能忽略的，所以有此「共相」，實是由每個在現實上遭遇挫敗的詩人所寫就的。因此，隱藏在這個「共相」下的，是每個詩人的「個別」生命遭遇——不論任何人，皆必須在生命困局中返身回來面對自己。因此，為詳細勾勒一條政治理想、現實遭遇，與文學成就之關係線索，本文選擇了初唐代表詩人陳子昂，希望藉著「人格」與「風格」兩條線索，從「超越的企求」中，呈現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向度。此外，透過對「人格」與「風格」之關係探討，本書希望可以更深刻地掌握陳子昂在文學史上的意義，以尋找到一個「更貼近」於陳子昂本身的立體面目，最後，亦希望透過論述的展開，提供一條古代詩人研究的詮釋路徑。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旨趣與方法	1
第二節 章節架構說明	24
第二章 人格的形成與理想的確立	27
第一節 文獻記載中的入仕前人格特質	28
第二節 入仕前的行事經歷與人格意義的探討	31
第三章 理想的確立與現實的互動	61
第一節 危言正色、抗議直辭的政治熱情	62
第二節 對武氏的擁戴與稱揚	101
第四章 現實的衝突與頓挫的產生	109
第一節 頓挫的產生與精神自由之嚮往	110
第二節 從頓挫之情尋求情感的紓解	120
第三節 從佛理的感悟評估紓解之效果	126
第五章 悲劇感的形成與終極情境的超越企求	133
第一節 用世之情的執著與悲劇感的形成	134
第二節 悲劇感的形成與存在的徹底孤絕	142
第三節 存在的徹底孤絕與歸隱的超越企求	158
第六章 超越成敗的評估與文學史上的意義	175
第一節 超越的探求與存在價值的失落	177
第二節 超越失敗的因素探討	192
第三節 從超越的失敗論文學史上的意義	198
第七章 結 論	211
參考書目	215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旨趣與方法

唐詩標誌著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最高成就。在初唐詩壇上，陳子昂以其詩歌創作：〈登幽州臺歌〉、〈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感遇〉詩，及提出興寄雅正的文學理論，在文學史上佔著關鍵性的地位，並得到歷代詩人的推崇。如韓愈便盛讚陳子昂在唐代詩壇的地位：

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註1〕

何以說陳子昂「始高蹈」呢？他的開創性意義在哪裡呢？陳子昂的摯友盧藏用說道：

宋、齊之末，蓋憔悴矣。逶迤陵頽，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註2〕

明·胡震亨則強調其作品的特色：

陳子昂初變齊、梁之弊，一返雅正。其詩以理勝情，以氣勝辭。〔註3〕

陳子昂的詩歌與其文學理論，在仍充斥著齊梁奢靡之風的初唐詩壇，可以說具有「橫制頽波」，使得「質文一變」的重大意義，且因著這個開創性的意義，故為李白、杜甫所推崇並作為詩歌創作的先導，如劉熙載便說道：

四子延陳隋之舊，故才力迴絕，不免致人異議。陳射洪、張曲江能

〔註1〕 見韓愈《韓昌黎集》卷二〈薦士詩〉，（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頁45。

〔註2〕 見《全唐文》卷二三八〈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臺北：中華書局，1982年版）。

〔註3〕 見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五〈上海古籍出版，1981年版〉，頁37。

超出一格，爲李、杜開先。人文所肇，豈天運使然耶？〔註4〕

陳子昂能夠「獨出一格」，在詩上表現其「以理勝情」、「以氣勝辭」的特點，並爲李、杜開先，是「人文所肇」的結果，而非「天運使然」。可見陳子昂在文學史上確有其特誌的風格，並以此風格得到歷來詩人的尊崇。

以上我們已大略的點出了陳子昂的貢獻及其在唐詩轉變中的地位。由於陳子昂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故引起歷來學者從各個角度，如陳詩的淵源、流派、文學理論，及其政治態度對陳子昂投以相當的注意力，希望可以更豐富地挖掘並賦予陳子昂詩歌的意義。然而，在廣泛的研究成果中，我們亦不免注意到一個現象，既然陳子昂在文學史上的成就是其「人文所肇」的結果，而「人文所肇」就劉熙載所載，乃指詩歌之風格繫於詩人之情志，〔註5〕則我們該從什麼角度理解這個「人文」，以說明陳子昂的「情志」與「詩歌風格」之關係？其詩歌創作與文學理論所標舉出的精神是怎樣的精神？二者之間的關係爲何？事實上我們認爲，一個適當的詮釋途徑，實關係著對陳子昂的詩歌風格與文學史意義的深刻掌握。而既然這是本文研究的重要企圖，在這裡，我們必須先針對陳子昂的詩歌特色及文學主張，尋找適當的詮釋方法。在交代本文的研究方法之前，我們可以先對陳子昂研究的成果略作檢討。

一、從文學本身標舉陳詩精神

在前文中，我們曾引盧藏用、胡震亨之言說明陳子昂詩歌的特色。事實上，「變」齊、梁詩風的觀點，一直是歷來學者對陳詩意義的主要評價方式。如高棅言：

唐初，文章承陳、隋之弊，子昂始變雅正，覓然獨立，超邁時髦。

〔註6〕

〔註4〕 見劉熙載《藝概》卷二〈詩概〉（臺北：金楓出版公司，1986年版），頁87。

〔註5〕 劉熙載在卷二〈詩概〉前論提出他對詩歌的看法：「《詩緯·含神露》曰：『詩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民知性情也。』此可見詩爲天人之合。」又說道：「『詩言志』，孟子『文，辭，志』之說本也。『思無邪』，子夏〈詩序〉：『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本也。」又：「〈關雎〉取『摯而有別』，〈鹿鳴〉取『食則相呼』。凡詩能得此旨，皆應乎風、雅者也」。以上是劉熙載評詩的重要觀點，簡言之，劉熙載認爲詩歌是作者「情志」之表現。例如，劉熙載第一條的評論言：「變風始〈柏舟〉。〈柏舟〉與〈離騷〉同旨，讀之當兼得其人之志與遇焉。」讀之「當兼得其人之志與遇焉」，可見劉熙載認爲詩歌可反映作者的情志。引文同上，頁83。

〔註6〕 見高棅《唐詩品彙》〈五言古詩敘目〉。

沈德潛亦云：

追建安之風骨，變齊、梁之綺靡，寄興無端，別有天地。〔註7〕

以上學者如盧藏用、胡震亨、高棅、沈德潛等人皆以「變」來概括陳子昂的詩歌特色與貢獻。自此以下，這個「變」的看法，亦成為近代研究陳子昂的學者所關注的焦點。在這個視野下，學者指出了陳子昂「變」齊、梁詩風的成就，是源於其對文學的「反省」。關於這個看法，例如，林耀潏先生指出陳子昂詩風的產生是因為：

反省建安以來，風骨詩風的由盛而衰的現象，及漸漸形成中的唯美律詩運動現象之外，對高古雅正詩風的嚮往。〔註8〕

將「反省」一詞，視為陳子昂之所以轉「變」詩風的解答是無疑的。然而，從「變」的創作成果，到對陳子昂「反省」文學的省察，在這條研究線索中，我們發現學者們雖然企圖為陳子昂的創作精神與理論根據尋找基點，但終究未能將造成陳子昂「反省」的因素找出來。何以言之？學者們對「反省」的注意，主要是從陳子昂所提出的文學理論而來。陳子昂首先在〈上薛令文章啓〉（680～682年作）看法：

然則文章薄伎，固棄於高賢；刀筆小能，不容於先達。豈非大人君子以為道德之薄哉？某實鄙能，未窺作者。斐然狂簡，雖有勞人之歌；悵爾詠懷，曾無阮籍之思。徒恨跡荒淫麗，名陷俳優。長為童子之群，無望壯夫之列。〔註9〕

就寫作動機來看，〈上薛令文章啓〉並非專為表達其文學主張而作（見本文第二章），故陳子昂並未在其中對其文學主張多作系統的著墨。作為陳子昂文學理論的綱領與代表，主要是其〈修竹篇序〉（697～698年作），〔註10〕文中說道：

〔註7〕見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一。

〔註8〕見林耀潏〈陳子昂詩觀研究〉（《孔孟學報第六四期》），頁200。

〔註9〕見《新校陳子昂集》卷十（臺北：世界書局，民國69年1月版），頁230。

〔註10〕關於〈修竹篇〉的寫作年代，據彭慶生先生的考證如下：「此篇《唐文粹》題為〈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並序〉，楊本及《全唐詩》作〈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並書〉，必作於東方虯任左史時。《舊唐書·宋之問傳》：『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預修《三教珠英》，常扈從游宴。則天幸洛陽龍門，今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虯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奇詞愈高，奪虯錦袍以賞之。』按：改控鶴奉宸府，事在久視元年（700）六月，見《通鑑》卷二百六；修《三教珠英》乃在聖曆至大足間（698～701），見《唐會要》卷三十六。據此，則東方虯任左史，當在聖曆前後。而子昂於聖曆元年歸田，其與東方虯交往，當在游宦東都之時。又詩云：『永隨眾仙去，三山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於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音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憂鬱。不圖正始之音，副睹於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

另外，在〈喜馬參軍相遇醉歌〉序（698 年作）及〈薛大夫山亭宴〉序（698 年作）序中，陳子昂亦零星地談到其文學見解。〈喜馬參軍相遇醉歌〉序〔註 11〕說道：

夫詩可以比興也，不言曷著。

〈薛大夫山亭宴〉序〔註 12〕亦說道：

詩言志也，可得聞乎？

從以上看來，正因為陳子昂提出了反對齊梁「彩麗競繁」的文學主張，並標舉出一條——以「漢魏風骨」、「正始之音」（以阮籍為代表）、「建安文學」為典範的，有興寄、風雅、骨氣、音情的文學道路，並在詩歌創作上作了實踐，因此便成了歷來學者關注陳子昂詩歌的重要線索。然而，正如前文所言，既然我們注意到了陳子昂對文學的「反省」問題，那麼，在這裡，更切入其文學理論核心的問題應該是：促成陳子昂「反省」的因素是什麼？事實上，筆者之所以注意到這個問題，亦是扣緊著其文學理論本身所呈現的幾個問題而來的。從〈上薛令文章啓〉看來，陳子昂雖然在文中標榜了阮籍，但是，從文意看來，陳子昂似以文章之事為薄技小能，視之甚卑。但自〈修竹篇〉序之後，又正面地表達了對文學的看法，則在其中，自然凸顯了一個問題，陳子昂究竟如何看待文學？從〈上薛令文章啓〉的以文章為薄技小能，到〈修竹篇〉序之後對文學批判、提出正面主張，甚至注意到文學技巧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因素促成他對文學的重視？此外，我們亦注意到盧藏用〈陳氏別傳〉〔註 13〕對陳子昂的一段重要評介：「工為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時人不知之」，從這段話看來，

游玉京」，正隱喻掛冠之意。故此篇當作於東征凱旋之後，表乞歸侍之前（697～698 年）。」見《陳子昂詩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頁 223～224。

〔註 11〕 見《新校陳子昂集》，卷二。

〔註 12〕 見《新校陳子昂集》，卷七。

〔註 13〕 見《新校陳子昂集》，附錄部份。

我們亦不免懷疑：為何「工爲文，而不好作」的陳子昂會將注意力放到文學上來，並以其文學主張，在文學史上佔著重要的地位？又當他正視文學的意義時，為何會對「正始之音」（阮籍）、「建安文學」……加以推崇？本文以爲以上問題是揭示其文學精神的重要關鍵，亦是隱藏在「變」的成果，及「反省」表象下的意義所在。

誠如前言，因爲對「陳子昂反省文學的內在動機」的探討多爲人所忽略，所以，時人便單純地從初唐時的文學背景，作爲陳詩產生的原因，並從陳子昂的詩歌創作與文學理論的互證，來推舉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以指出其詩歌的內在精神。如林耀潏先生在提出「反省」之後，便繼而說道：

陳子昂提出了「風骨」、「風力」、「興寄」等復古的詩觀，其所以能啓大唐盛音者，固由於時代背景及文學本身內在發展的因素使然，然其本身詩作的實踐，更能應證其詩觀的正確，理論與實踐的相得益彰，才使陳子昂在唐代詩壇上佔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註14〕

如果忽略了「反省」動力的探討，我們便極容易將其文學表現視爲「時代背景及文學本身內在發展的因素使然」，若果「時代背景及文學本身內在因素」真的可以促成陳子昂的詩觀，那麼，何以在眾多詩人中，獨陳子昂有如此的「反省」？如果我們找不出促成陳子昂「反省」的內在因素，則便承認了陳子昂的詩歌創作與文學理論的產生，其意義只在於爲反動齊、梁而反動。如果只是爲了反動而反動，陳子昂又爲何特別標出阮籍、建安作爲其文學主張的典範，並在詩中對其理論作出實踐？此外，詩歌創作中的什麼特質，和其文學理論是相得益彰的？僅就詩歌中的一些對現實描寫、對身世慨歎的篇章，就能夠說明「相得益彰」的精神所在嗎？由此觀來，若我們要討論陳子昂詩歌的精神，不僅要將其「反省」的內容找出，更要對促成其「反省」的內在根據作出說明。否則，就文學本身出發，我們不但無法解釋陳子昂轉變詩風的必然原因，更無法直接從其文學理念中，印證出詩歌如〈登幽州臺歌〉等詩產生的必然性。則我們又如何對陳子昂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作出適當的評估呢？

行文至此，我們要再度強調的是，我們並非否定詩歌理論與實踐互證的正確性。事實上，片面地從陳子昂反對齊梁詩風、提倡復古精神來討論他的詩歌精神，在理論上的確呈現出「捉襟見肘」的窘境。從當今陳子昂所遺留

〔註14〕同註8，頁206。

下來的詩歌作品看來，除了如〈登幽州臺歌〉、〈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感遇〉詩……等代表詩作外，亦有不少的應制、遊仙等詩作，而當我們片面地以其「文學理論」的觀點來審視這些詩作時，這些詩作的產生卻反顯出其文學理論的矛盾。如周子瑜先生則乾脆認為這些詩作之所以產生，實因其詩論的「落後性」促成。他說道：

他的組詩〈感遇〉中的多數作品，以及其他如〈洛城觀酺應制〉、〈奉和皇帝丘禮撫事述懷應制〉等篇，不是抽象議論，就是直露的歌功頌德之語，甚至是佛道教義的抄錄，這不能不是他那復古詩論消極影響的後果。〔註15〕

可見，若逕以「理論與實踐的互證」來涵括陳子昂的詩歌精神，不僅難以從其「文學理論」尋找詩歌創作的依據，其文學理論甚至可能因此而遭致否決。事實上，就文學本身的發展線索而言，陳子昂的文學成就不可能無根而生，故不可能和齊、梁與初唐的文學道路截然斷開，〔註16〕因此，面對著陳子昂詩歌的各種風貌，我們所要尋找的答案是，陳子昂反對的齊、梁究竟有什麼特定的內涵？動機何在？創作和理論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共同的精神？以上問題又再度促使我們對決定陳子昂創作題材，與文學見解的原因找出答案。

以上我們實在觀照一個問題：決定陳子昂詩歌創作（包括理論）的題材選擇、內容表現的因素是什麼？我們可以清楚看出，逕由文學本身（或詩歌理論與創作的互證）來探討陳詩的精神時，實已放棄了對作者「主體意志」的探求，並否決了「主體意志」在文學創作（包括理論）上的必要性。這正是我們無法為其應制類、遊仙類詩歌的產生找到必然根據的理由。既然僅就文學的本身無法圓滿說明陳子昂的詩歌精神，那麼，我們應該採取什麼詮釋方法呢？

〔註15〕 見周子瑜〈陳子昂的詩論、詩作及其與魏晉六朝詩歌之間的關係〉（《陳子昂研究論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年版），頁122。

〔註16〕 如周子瑜先生便從陳子昂的詩歌特色，強調其對六朝文學的吸收與消融。（《文同上》，頁123）。又，畢萬忱〈論陳子昂詩歌理論的傳統特質〉亦以為陳子昂的詩論其實有向齊、梁吸收之處（《文學遺產》，1990年3月）。又秦紹培在〈陳子昂評價質疑〉一文中亦有相近看法（《新疆大學學報》，1986年2月）。其實，本文認為，陳子昂文學主張的些許言論背後，應該含有一段豐富的文學思考，這和陳子昂的思想、與環境的互動都是分不開的。因此，若僅就其理論文字本身出發，當然容易引發學者從自我著重的面相切入，而造成不同的看法。

二、從時代的影響標舉陳詩精神

將注意力從文學本身抽離出來，已有不少學者注意到詩歌的精神，不能直接從作品的本身去掌握，更應該將其放在「時代」的這一條線索中討論。關於這個看法，主要是從陳子昂詩歌的內容而來。例如韓理州先生便歸納陳子昂詩歌的思想內容為：〔註17〕

- （一）關心廣大兵民的生活，同情他們的苦難。
- （二）關心國家命運，揭露和批判時政弊端。
- （三）感慨身世，揭示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傾吐壯志難酬的幽憤。
- （四）維護國家的統一安定，熱愛祖國美好的山河。
- （五）宣揚道家思想，讚美隱逸生活。

以上數點，的確將陳子昂詩歌的內容作了完整的描述。那麼，陳子昂這些詩歌的思想內容是如何產生的呢？韓理州先生在〈陳詩的產生〉一文中說道：

作為觀念型態的文學藝術，他既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又與社會現實保持著緊密關係。要弄清陳詩問世於初唐後期的原因，還得聯繫初唐後期的社會狀況，剖析它在自身發展中表明的必然性。〔註18〕

那麼，社會狀況如何促成陳子昂詩歌的產生呢？他如何解釋這個「必然性」呢？

陳子昂的詩歌，實質上是齊梁詩風已經發展到了非變不可下的產物；是初唐國力上升，豐富多彩的新生活要求詩歌革新的產物；是隊伍持續壯大的庶族知識分子同貴族階級的文化鬥爭的產物；是與脫離現實的文藝思潮鬥爭的產物。我以為，從這些意義上去理解陳詩，大概可以更加深入地弄清他在唐詩發展史上所起的開關闢道作用。〔註19〕

既然注意到陳子昂在唐詩發展史上的「開關闢道」的作用，又將其貢獻完全視為「時代」的產物。那麼，陳子昂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應時而生」的人物，則有何重要性之有？就陳詩的思想內容看來，我們的確可以從中看出初唐社會的風貌，但是，隨著這個命題的提出，我們不免產生疑慮，如果從「時代的產物」來理解陳詩，為什麼在初唐社會的諸多詩人中，獨陳子昂對「時代」

〔註17〕見韓理州《陳子昂評傳》（西安：西北大學，1987年版）第七章第二節。頁109～120。

〔註18〕見韓理州〈陳詩的產生〉（《陳子昂研究》，上海古籍1988年版），頁106。

〔註19〕同上，頁107。

有如此的穎悟？又初唐社會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影響陳子昂的詩歌創作？除非我們承認初唐社會可以直接導致陳詩的產生，並決定其思想內容與精神，否則，我們便不能規避以上所提的問題。此外，若說陳子昂的文學內容「反映」了時代風貌，故其文學是時代的產物。但是，一個時代所包含的內容是如此的紛紜繁多，難道時代的眾相皆一一行諸於陳詩中嗎？「時代」雖然提供了作者一客觀的環境，但這個客觀環境必須經過作者的主觀消化，才能顯出其意義來，那麼，「時代」提供了陳子昂怎樣的客觀「環境」呢？陳子昂又以什麼態度在接受、反映、甚至批評他的「時代」呢？在這裡，我們實已點出了「作者」與「環境」關係的互動，〔註 20〕唯有對這個互動關係的揭示，我們才得以掌握陳詩與時代的關係。否則，便無法理解，為何身處於「初唐」的陳子昂，卻在詩歌理論與創作上，表明其對前代詩人（阮籍）的推崇？〔註 21〕除非我們認為陳子昂對阮籍的注意完全是一種「偶然」，然若是「偶然」，那麼，「正始之音」、「建安風骨」又如何解釋？又，如果陳子昂的詩歌與文學理論的精神，只在「如實地」反映出「時代」的各樣風貌，何以到了盛唐，李白、杜甫仍對此「初唐」的產物傾慕不已呢？從這條「承先啓後」的文學道路看來，我們發現，貫穿於這條文學道路，其實是有著陳子昂的自我意志。因此，在這裡我們必須探討的是，陳子昂是在怎樣的情感狀態下，創作了這些詩歌？以上問題，皆在在地要我們對「主體意志」在詩歌作品上的意義作

〔註 20〕在這裡，我們尚可以「思想史」的方法對此課題加以理解。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強調人的思想是起於人對「環境」所起的「意識反應」。所謂「環境」是指：「所有的時間與空間之內，人類環境中的所有持久的特徵。如全人類的生、死、愛等等普遍的共同象徵，或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之內特殊的社會與文化的環境。人類總是生長在特殊的社會之中，具有特殊的制度、特殊的文化背景、特殊的思想潮流等等。」所謂的「意識反應」包括：「感情的態度」（emotional attitudes）、「感動力」（pathos）、「感覺的傾向」（propensities of feeling）。所謂人對「環境」所起的「意識反應」即本文在此處所強調的「作者」與「環境」的互動。引文見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著，張永堂譯〈關於中國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臺北：聯經出版社），頁 3～5。

〔註 21〕陳子昂〈上薛令文章啓〉說道：「悵爾詠懷，曾無阮籍之思」，而其推崇的正始文學，亦以阮籍為代表。至於在陳子昂的詩歌創作上，學者亦多以為其淵源於阮籍。如皎然在《詩式》卷三便言：「子昂〈感遇〉三十首，出自阮公〈詠懷〉」，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二言：「四傑、梁、陳也；子昂，阮也」。從其〈感遇〉組詩中，無論在詩意或是描寫手法上，我們確實可以看到阮詩對陳子昂的影響，如韓理州先生便在〈陳詩的淵源〉一文中，對陳、阮詩歌的遣詞造句作過比對。見《陳子昂研究》（上海古籍，1988 年版），頁 133～137。

一番探討。在這裡，我們實已再度點出了本文研究的企圖，即希望藉由書學歷程與主體生命之關係，找出一條詮釋陳子昂詩歌精神的方法，並以此呈現陳子昂受到歷來學者關注的各個面相。

以上，我們從文獻檢討中指出陳子昂詩歌所存在的若干問題，從這些研究角度所無法解釋、涵蓋的諸多問題中，我們亦發現，這些問題之所以無法被解釋或涵蓋，實源於這些詮釋方法，皆明顯的偏執於他們所關注的某一個面相：或逕由文學本身探討陳詩精神之所繫，或逕從詩歌內容論述時代之必然性，忽略了「文學」的內在根據繫乎「作者」，詩歌所呈現的「時代」意義在於「作者」與「環境」的互動。行文至此，我們實已點出本文的研究取向，本文將以「文學是人格的投影」的思考方向，作為詮釋陳子昂詩歌（包括理論）的途徑。以下，我們當可就「文學」與「人格」（強調作者與環境的互動）二者的關係稍作說明，以此揭示出這個思考方向在本文研究上的意義。德國著名作家歌德曾說過：

在藝術和詩裡，人格確實就是一切。……關鍵在於是什麼樣的人，才能作出什麼樣的作品。〔註22〕

「是什麼樣的人，才能作出什麼樣的作品」，將「人格」與「文學」的關係作了最好的說明。關於這一點見解，十八世紀末，德國著名文史學家狄爾泰亦作了強調：

真正的傑作不可能試圖去反映一種不同於其作者的內在內容（geistigen gehalt）的實在。〔註23〕

近人何向陽先生則更詳細地分析了兩者的關係，他說道：

人格是一種選擇，文學則直接地體現著這種選擇，什麼樣的人格，對應於什麼樣的創作，人格的高下決定著文學的品位，文學的存在決定了文學家的存在（方式），而文學家的存在方式同樣決定了文學的存在（價值）。二者是互依的，人格與文學的辯證關係同樣說明了作家人格與文學品格的對應性。〔註24〕

〔註22〕 見愛克曼著、朱光潛譯《歌德談話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9月版）。

〔註23〕 狄爾泰是十八世紀著名的文史學家，亦是「詮釋學」理論的重要學者。其一生的職志在為人文科學尋求適當的詮釋方法，關於對藝術作品的見解，他認為：藝術作品是「活生生的經驗之具體化」，並說到：「畢竟……對內在生命的結構的把握是基於對作品的解釋，在作品中，內在生命的結構最終完滿地得到表現。」見帕瑪（Richard E. Palmer）著、嚴平譯《詮釋學》（臺北：桂冠圖書，1992年版），頁129、130。

〔註24〕 關於「人格」與「文學」的一不一致性的問題，一直是文學研究中的爭議

在前文中，我們曾經說到，要掌握陳子昂的詩歌精神，必須對陳子昂創作詩歌（與提出理論）的動機有所了解，另外，我們亦必須在其詩歌（與文學理論）中，對陳子昂與環境的互動關係作出解釋。以上問題，在「文學的存在決定了文學家的存在方式，文學家的存在方式同樣決定了文學的存在價值」的論點下，得到了充分的印證與肯定。因此，本文將以書寫者的「人格」線索，作為研究陳子昂詩歌的途徑，為其文學作品的產生與精神找到內在的根據。此外，亦要從文學作品中，對其所透顯的人格特質作一番深入探究。

既然「人格」是研究「文學」所不能忽略的重要面相，那麼，本文為何標出「超越企求」的這條人格發展線索，作為詮釋陳子昂文學的基點？它是詮釋陳子昂詩歌的合理途徑嗎？

在交代本文研究的觀點之前，我們可以先就陳子昂的詩歌出發，探討其被歷來學者一致推崇的特色風格，以此說明本文的詮釋方法，的確是扣緊著陳詩的特質而來。清朱鶴齡說道：

蓋古人文章無不以真得傳者。真有感傷，而後有阮公、正字（陳子昂）之詩。〔註25〕

從「真」的評價中可知，朱鶴齡認為陳子昂的詩歌特質，是因在其作品中，如實深刻地表現出自我的情感，且因詩歌所蕩溢的「感傷」之情的真摯，故成就了其在詩壇上的地位。宋育仁亦說道陳詩的情感特質：

（陳詩）緣於小雅，故有怨誹之音。〔註26〕

焦點。何向陽先生對此問題有精闢的看法。他說道：「……並不是說我們不承認人格悖論現象。作家——人類精神的先鋒與歷史事件的敏感者，更是承受著理想人與現實人相衝突的雙重角色，經歷著他所處的時代和他超時代的思想間的鬥爭較量，承受著對精神的追求與個人各種慾望與利益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相互排斥的內心撕裂感……在人的性格成長中形成兩股反向的拉力，使人處於感性與理性、理想與現實、種族與個體的纏繞、糾結中，由此凸顯出的含蘊作家創作精神的文學作品便不可能是單純、同一的，而必然表現出複雜紛繁的型態。因此，作家人格中各因素矛盾、分裂、悖離狀態等普遍現象，也將在文學創作中表現出來。」也就是說，「人格」與「文學」的不一致論點，常是將「作家的現實人格或人格在現實層面的某一階段的表現當作作家人格整體的研究……。」從這裡看來，「文學」與「人格」的關係，當可啟發我們對文學作品的意涵有更深一層的思索。引文見何向陽〈文學：人格的投影——文學研究的一個思路〉（《文學評論》，1993年1月），頁14、15。

〔註25〕見朱鶴齡《愚庵小集》卷八〈宗定九全集序〉。

〔註26〕見宋育仁《三唐詩品》，卷一。

本文在這裡不擬討論陳詩和小雅的關係，但是宋育仁在其中所標出的「怨誹之音」，和朱鶴齡說的「真有感傷」，在意義上是相通的。那麼，這份「真」的情感，是如何在其詩中表現並成為其詩歌特質呢？陳子昂的詩歌，在文學史上最享盛名者為一系列的〈感遇〉聯章詩、〈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登幽州臺歌〉，它們既是陳子昂的代表作，我們當可就此找出一條陳子昂的情感線索。首先，我們可就〈感遇〉所標示出的特色作一番觀察。刑孟在論〈感遇〉的旨意時說道：

〈感遇〉詩；歎君子失時而無成，仁可親，殘不可近。衰世不明古道，戒嘗利，寵不可久居，寵利必見禍奪。情愛生禍，材美多累，多言喪道。大運所向，豪聖難為。（註27）

近人楊玉祥先生亦有相同的看法：

陳子昂三十八首〈感遇〉詩，沒有纏綿悱惻和淺斟低唱，也沒有時代的歡歌，幾乎都是不平之鳴與時代悲歌。……表現了治國平天下的自覺的兼濟意識和對人生執著追求的使命感與社會黑暗現實相拼搏的憂憤激越的情感，表現了詩人與國家民族共患難的文化心理以及對祖國千年歷史的反思精神。（註28）

我們可以「不平之鳴」來概括詩中所表現的「感傷」、「怨誹」的情感（這些情感的真摯由詩中所表現的使命感、激越情感、文化精神、反思精神透顯出來），而其所以不平，乃是詩人「失時」、「不遇」所致。其實不只是〈感遇〉詩，〈登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登幽州臺歌〉亦皆點出這個「不遇」的命題。例如唐汝詢在評〈燕昭王〉一詩（〈登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之一）時說道：

彼其霸圖既泯沒，而我特為惆悵走馬重遊者，豈非深幕其人之丰采耶？意謂：世有燕昭，則吾未必不遇。（註29）

此段評語雖是因〈燕昭王〉一詩而來，但亦統說了〈薊丘覽古〉七首的精神。「不遇」一詞，再度強調了陳詩中的「感傷」與「怨誹」之特質。清·翁方綱在統論〈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時更說道：

〈薊丘覽古〉諸作，鬱勃淋漓，不減劉越石。（註30）

〔註27〕見楊鍾義《歷代五言詩評選》卷五所引。

〔註28〕見楊玉祥《陳子昂〈感遇〉詩審美情趣初探》（《陳子昂研究論集》），頁202。

〔註29〕見唐汝詢《唐詩解》卷一。

〔註30〕見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一。